

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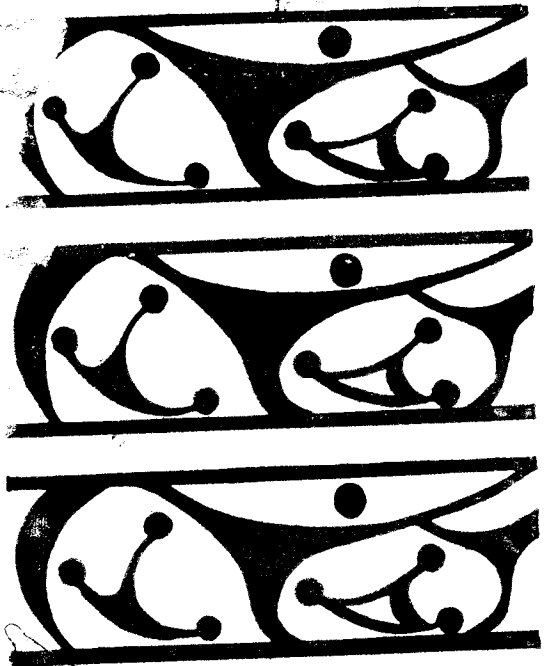


俞佩刚

于成龢

I056
19
2

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



何佩刚
于成鯤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南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

何佩刚 于成鲲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5 字数20万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 10110·507

定价: 1.90元

序 言

蒋 凡

古老的中国，是诗的世界，同时也是散文的艺术王国。过去常是“诗文”并称，统领风骚，雄霸文坛，达数千年之久，其中自有它成功的奥秘。而从“五四”以来，情况变化：新诗虽曾崛起于一时，但读者日稀，人兴式微之叹；散文则仍然朝气蓬勃，以它无限的生机活力，与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争奇斗艳，鼎足而三。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新诗受“欧化”影响既骤且深，盲目割断历史，抛弃古典诗歌传统，因而基础不牢，生命脆弱；而现代散文则多取拿来主义，推陈出新。所以能获得新生命，长盛而不衰。如鲁迅先生的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焕发了时代的光辉。但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曾明白地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见于鲁迅《南腔北调集》）聪明的作家就是这样善于学习，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从中汲取了壮大新文学机体的必要营养。于此可见，我国现代优秀散文与古典散文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事实证明，学习古典散文，以作为发展新思想新文化的借鉴，很有必要。

但是，如果象现在某些人那样，以欧美“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典散文，那么纯粹的摇荡性灵、流连光景的文学作

品，可说是寥若晨星，所剩无几了。以这样的界限划分，就会置文学史实于不顾，把中国古典散文的范围，局限在一片狭小的天地中，根本无法自由舒展。事实是，与西方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对于散文，多取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因此，纯然赏心悦目的超功利的“游戏”之作极为罕见，而更多的是“尚用”的艺术名篇，其中议论文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读者只要随意翻阅一下诸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古文选本或总集，象贾谊《过秦论》，韩愈《师说》，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几乎是无书不录，地位显赫。中国古典散文自有它的特点，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西方的观念是行不通的。从文学实际出发，学习与研究中国的古典散文，首先就必须在议论文方面下苦功夫，这又是合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如果人们有意游览观赏一下中国古代议论文的艺术境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由何佩刚、于成鲲二位同志奉献给大家的《中国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便是一本既具体生动、又有一定学术性的导游之作，它循循善诱，引人入胜，通过详细的艺术分析，努力作高屋建瓴的理论性概括，从而揭示了古代议论文的艺术三昧。

首先，入选本书的文章，尽是充满激情的一代佳作。于此可见作者的艺术眼光。古代的议论文浩如烟海，并非字字珠玑。专门作哲学思辨而不带抒情色彩的文章，虽有议论而乏文彩，不在艺林之中。而如古代大量诏、册、奏、议一类的实用公文，其中许多虽然合乎“尚用”标准，但却毫无艺术可言，枯燥乏味，自然也在剔除之列。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在中国古代，又常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封建士人中少有专职的作家。人们常是有为而发，因“尚用”而侃侃议论；而议论之时，又自然“愤于中而形于外”，以其浓烈的感情色彩，撼动了人们的心

弦。这一类议论文，情文并茂，声色俱佳，脍炙人口，千古流传，自然成为艺苑奇葩，令人赞叹不已。议论是为了说理，但优秀的议论文则不仅是以理服人，而且进一步动之以情，情理自然浑融，愈加富有感人艺术力量。试想，人的思想情感莫非“情”与“理”二字，情、理沟通，人心还有什么不通的呢？所以唐李商隐《无题》诗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句。优秀的议论文，由于说理需要而感情自然迸发，化为千古的心音律动，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艺术魅力，这是必然的事。人们在阅读这些艺术名篇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人的高风亮节，不同作者的复杂感情形象，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给人以教育，给人以感染。优秀的议论文，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与感人力量。

其次，古代议论文的情理完美统一及其感情形象，又必须通过作者的精心艺术安排来实现。清刘大槐《论文偶记》指出：“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议论文的中心是议论，但议论又自有其艺术工巧，也就是“即物以明理”（即借助记叙事物来说明道理）和“即事寓情”（即通过描绘具体事实来寄寓丰富的感情）。于此可见，表现情理的议论，离不开具体事物的描画，也就是说，必须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化艺术手法。学习和研究古代优秀的议论文，的确有助于写作艺术技巧的提高。不同的艺术名篇，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起承转合，波澜跌宕，以及修辞手段和心理分析诸方面，常是别具只眼，独出机杼，给后人的创作以良好的启迪。但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古人常常发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虚之论，令人有莫测高深的慨叹。现在，《中国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则不同。它的作者一反古人玄虚之论，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力求加以科学的

说明。赏析文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流畅，令人读来饶有兴趣，既丰富了文学知识，又象喝一杯陈年醇酒一样，沉醉在美的回味之中而不自知。就古代议论文的艺术技法方面，作者所论非常广泛，涉及到美学的许多领域，细心的读者，只要认真翻阅一下目录页上的标题，自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及其艺术分析的复盖面。其中，既介绍作家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主体意识，同时分析了读者的接受联想和艺术效果；既涉及创作的外部规律，又注意创作的内部规律；既有修辞研究，又着眼于微妙的心里剖析……。总之，作者要言不繁，如实道来，以其热情洋溢的彩笔，为广大读者辛勤地耕耘渲染。当然，我们也记住了古人所说“大匠与人规矩而不能使人巧”的名言，古人成功的经验，并不能代替今人的实践。聪明的读者，在学习的同时，也自会细心揣摩推敲，认真思考领悟，在深入探索与反复实践中获得新的创作升华。

当然，由于条件限制，《中国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一书也非尽善尽美。比如因为篇幅所限，古代优秀的论文很多，无法一一采撷，令人读完之后，偶有遗珠之叹。又如二位作者，因为写作个性的区别，个别地方，文风也难以完全统一。但与本书的贡献相比，这些仅是美玉微瑕，无关大局。全书的熠熠光彩，一定会吸引广大读者的。

何佩刚和于成鲲二位同志，是我多年的熟友。他们在复旦大学与上海大学中文系执教，从事过写作及其他课程的教学，积多年之经验，为培养青年学生付出了无数的劳动与心血。《中国古代论说文笔法探胜》又是他们笔耕的共同的业绩。书稿剞劂之时，承蒙二位美意，令我先睹为快，并嘱作序。君子不耻下问，小人贡献一得之愚。絮絮叨叨，谈点体会，聊以代序。

一九八七、三、廿五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言.....	蒋 凡
类比推理, 步步归谬.....	(1)
附 墨子《非攻(上)》	
条分缕析, 精密简炼.....	(6)
附 孙武《谋攻》	
反戈相击, 旁征博引.....	(12)
附 孟子《许行之言》	
取事设譬, 正反对照.....	(22)
附 庄子《马蹄》	
即物明理, 比喻丰富.....	(30)
附 荀子《劝学》	
深研细剖, 归纳周详.....	(39)
附 韩非《说难》	
借题发挥, 反面论证.....	(48)
附 《国语·王孙圉论楚宝》	
联类喻义, 由小及大.....	(53)
附 《战国策·庄辛谓楚襄王》	
铺陈史实, 对比驳论.....	(60)
附 李斯《谏逐客书》	
先叙后议, 篇末揭题.....	(68)
附 贾谊《过秦论(上)》	
方比物类, 定于有证.....	(78)
附 王充《雷虚篇》	

先张其本，后申其说·····(88)

附 晁错《论贵粟疏》

隐喻明理，旁敲侧击·····(94)

附 枚乘《上书谏吴王》

质疑设论，正意反说·····(100)

附 东方朔《答客难》

曲笔解嘲，云谲波诡·····(106)

附 韩愈《进学解》

反复辩驳，穷形尽相·····(115)

附 柳宗元《桐叶封弟辩》

胸藏机杼，笔势纵横·····(122)

附 杜牧《罪言》

一字立骨，逐层推浪·····(134)

附 皮日休《原谤》

叙议相融，抑扬相衬·····(138)

附 欧阳修《伶官传序》

论旨贯一，布局严谨·····(144)

附 苏洵《六国》

笔势峭折，尺幅兴波·····(151)

附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各个击破，逐一反驳·····(156)

附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因事论人，雄视古今·····(160)

附 苏轼《范增论》

托物讽谕，辩驳奇诡·····(165)

附 刘基《卖柑者言》

辩证分析，实践验证·····(169)

附 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	
对比分析, 层层递进·····	(173)
附 黄宗羲《原君》	
以物类比, 析理透辟·····	(180)
附 王夫之《均天下》	
借寓立论, 描述生辉·····	(185)
附 龚自珍《尊隐》	
宏观细论, 气度从容·····	(194)
附 曹丕《典论·论文》	
精思苦琢, 辞章凝炼·····	(202)
附 刘勰《神思》	
高度概括, 具体阐述·····	(210)
附 白居易《与元九书》	
书信问对, 言浅意深·····	(225)
附 韩愈《答刘正夫书》	
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	(229)
附 苏轼《答谢民师书》	
取繁以简, 褒贬自如·····	(235)
附 李清照《论词》	
精研一理, 连锁推论·····	(243)
附 李贽《童心说》	
自立新说, 例证恰切·····	(250)
附 李渔《立主脑》	
攷其特征, 对应求证·····	(256)
附 狄宝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后记·····	(265)

类比推理，步步归谬

——墨子《非攻(上)》析

《非攻》是墨子阐述其非战思想的论辩性文章。原文分上、中、下三篇，可以各自独立，这里选析上篇。墨子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出身贫寒，其学说代表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非天命、兼爱互助、选贤任能；反对攻战，提倡节俭；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些都是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但《明鬼》诸篇又表现了唯心思想倾向，于此可见其思想的复杂。非战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严重地破坏生产和影响小生产者安定的生活，墨子坚决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攻战和兼并。他游历楚国时对鲁阳文君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指被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因此，墨子企图通过自己学说的影响和自身“摩顶放踵”、“墨突不黔”地游说，而制止这类损人不利己的不义之战，使老百姓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非攻》一文的主旨是，驳斥那些以大攻小、以强凌弱，反自以为是知仁义的“君子”们，阐明“攻国”是大不义的基本观点。文章的论证方法是很有特点的。作者并不去历数攻国的种种罪行，也不在“义”与“不义”的概念上去作辩解，而是运用一系列浅易的社会生活中的事例作譬喻，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进行

类比推理，从而论证了攻国为大不义和“君子”们颠倒是非的无耻。

墨子这种运用事实譬喻来说理及重视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不是偶然的。他的学说，在方法论上曾经提出“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就是说判断是非和认识真理，要言必有据，以“古者圣王”的言行为标准；发言立论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以人们的现实经验为根据；立言著文要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客观实际效果出发。这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墨子的文章充分运用生活事例，借物以明理，论据充足，说理透彻，正反映出他的认识方法的特点。同时，墨子又提出“譬”、“侔”、“援”、“推”的一套逻辑推理方法。如说“譬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这是指引物譬喻；“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这是指依据某一些事物而类比推理。所以墨子的文风逻辑严密推理清晰。

本篇可分三个段落，每段都举出具体事件作譬喻来进行类比推理，令人信服地推论出“攻国”是大不义的行为。第一段引用偷窃桃李、鸡犬、牛马，乃至杀人、抢劫的事例来同“攻国”作类比。由于盗窃、抢劫、杀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损害别人利益的犯罪行为，而“攻国”的性质与上述行为正相同，从而证明了“攻国”也是损害别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顺势指出那些热衷于“攻国”者，却只认为盗窃、抢劫是不义，而不认为攻国是不义，岂不证明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义与不义吗？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类比推论的过程中所援引的事例，又是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层次分明，步步紧逼。先说入人果园偷其桃李，次说盗人犬豕鸡豚，复次举私入栏厩，牵走别人牛马，最后则举出杀人抢劫，这一系列事例的损

人利己和不仁不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但这样排列却显出程度是越来越加深，就有力地强调了损人越多，不仁不义就越重，犯罪就越大。由此推论出“攻国”是比以上各项都更严重的损人利己事件，足见其不仁不义更甚，其犯罪更大，就更加不可轻视了。这种寸寸深入，步步归谬的推理，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如一把钳子越收越紧，使最后得出的结论非常牢固。

第二段中采用同样类比推理的方法，由杀一人，到杀十人，再到杀百人，由少到多，说明杀人越多，不义越深，死罪越重，从而推论出“攻国”动辄杀人千万，不义最深，主谋者的死罪必有千万重了。“攻国”有罪既确定无疑，于是进一步揭露“君子”们颠倒是非的言论，他们不但不把“攻国”认作有罪，反而把它当作仁义之举而加以宣扬，并记入史册，遗留后世，这岂非明显的荒谬绝伦吗？步步推论的方法，使“攻国”行为的错误与不义显得更加明瞭和突出，容易被人识破了。

第三段，是在前两段已证实那些“君子”们只知小不义而不知大不义的基础上，着重揭示他们反对小为非而鼓吹大为非的自相矛盾。这里仍采用举事以类比的方法，用不分黑白和不辨甘苦的事例，来类推出不辨义与不义。指出有人见黑色少的承认是黑色，见黑色多了反倒说成为白色；有人尝苦味少的承认是苦味，尝到苦味多了反倒说成是甘甜的，这岂不自相矛盾而荒唐可笑吗？然而，这同只知小为非而不知大为非，只反对小不义而提倡大不义，恰是相同性质的问题。这样就更清楚地证实了那些“君子”们的头脑昏庸，不辨“义与不义”，是愚蠢可笑而理当加以反对的。于是，最后再一次反证了作者的“攻国”是大不义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

以上的剖析可见《非攻》一文的写作特点，一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观点，以事物明理，具体切实，不作空论；二是进

行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的有层次的类比推理，逻辑严密，论辩性强。文章把援引事例和逻辑推理二者结合得很紧密，从而取得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效果。过去有人认为墨子学说的衰微，同他的文章质朴而少文采，缺乏雄辩气势有关系，说：“其为道，瘠薄而寡泽，言之垂于后世者，质而不华，务申其意而不驰骋其辞”。其实，墨子的文章重事实材料，质朴无华，正是其优点，很难说墨学衰微的原因在于文章本身的风格。韩非子曾说过，楚王问田鸠（墨学追随者），墨子“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田鸠回答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田鸠注意到墨子文章的实用性是对的。但所谓墨子文章的“不辩”，不应该认为是缺乏论辩性之谓。从《非攻》也可以看出，墨子文章的特点在于不空谈，不诡辩，不在概念上兜圈子，而多凭事实材料进行说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逻辑论辩性，加上文辞朴实，确实颇有实用价值。

（何佩刚）

非 攻^①（上）

墨 子^②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③，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④，罪益厚。至入人栏厩^⑤，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⑥，取戈剑者^⑦，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亦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

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⑧，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⑨？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⑩。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⑪。

【注释】

(1) 《非攻》：选自《诸子集成·墨子闲诂》。原文分上、中、下三篇，今选上篇。非：非难，驳斥，反对。(2) 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由他的弟子和后学辑成《墨子》一书，共71篇，现存53篇，其中有的非墨子所作。在战国时代，墨家与儒家曾并称“显学”。到了汉代儒学一尊而墨学衰微。

(3) 攘：取，盗窃。豕：猪。豚（音tún）：小猪。(4) 兹：同滋，益也，此处为更加之意。(5) 厩：养马牛的栏圈。(6) 拖：同拖，夺取。(7) 戈剑：意指金戈宝剑之类价值昂贵的财货。(8) 情：通诚，实也，实在之意。(9) 奚：何必。(10) 辩：通辨，辨别。以下诸“辩”皆同。(11) 乱：混乱，混淆不清。

条分缕析，精密简炼

——孙武《谋攻》析

《谋攻》是《孙子兵法》中的一篇。《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为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孙武所著。此书系统化地总结了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经验，但又不是具体战例的记述，而是通过细密的分析和简炼的概括，从军事实践中提取出规律，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此书在文体形式上则又带着语录体的性质，它的每一段落的含义都具有独立性，一段话表达一个论点或一条经验。但是，每篇中所有的各段落又能共同反映出一个方面的中心内容，如《作战》、《谋攻》、《兵势》、《虚实》等篇名所显示的。这种语录体自然属于论说性文章，它同《论语》、《孟子》那样的具有时间、地点、人物、对话、叙事的语录体相异，各有不同的风格。《孙子兵法》的论断简明，推理严密，剖析精详，要言不烦而不取具体例证，这同《老子》的文体风格相近似。

《孙子》所论述的军事思想，全面而精深，博大而恢宏，包括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如何统帅军队，如何确定战略战术，如何备战、行军、指挥作战，乃至如何用火攻，如何用间谍等内容。《谋攻》篇主要是讲战略思想的。为谋划进攻，确保胜利，要求统帅者对战争有全局性的认识和总体的指导思想。谋攻，就是战前的运筹帷幄，如曹操所说：“欲攻敌，必先谋”。

在本篇里，孙武强调要“以全争于天下”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最高的战略目标。就是说，尽量争取实现不开战而能使敌方举国来服，全军降顺，不直接依靠战争而又能获取完全的胜利。文章以此为中心，逐层论述了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战略地位，怎样计划战役和部署兵力，怎样保障军事统帅的独立指挥权，怎样知己知彼，把握胜利的条件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有关战略决策的全局性问题，虽未引证具体战例，但完全可以体察出这些分析和论断是从历史上众多战争实践中提炼、升华而来，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从文章结构上看，全文虽分为七个独立的段落，每段谈一个不同的角度，但各段相互间具有内在联系。首段提出的以“全胜为上”的最高战略目标，正是全篇的纲领，各段内容都与它相沟通，第二段起，每段开头所用的“故”字，就是各段同首段相沟通的联系词。各段的内容也都围统力取战争的全胜这个中心问题，因而全文的段落组织既富有节奏上的顿挫之感，又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气势。

《谋攻》篇在写作上更重要的特点，是善于分析与综合。它把一个问题划分为若干方面去剖析，把一个意思划分为若干层次去表达，把同类现象加以并列地归纳，真正作到条分缕析，精密简炼。首段一气举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等规律相同而战况大小不同的战略目标，从而透彻地说明了全部收服和击破而胜这两者的轻重得失。这里用同类归纳的方法，但又排列出由大到小的逻辑层次，故次第深入，气势逼人，令人信服。然后由此而推导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综合性结论。前面的归纳对这个结论起到了有力的论证作用。第二段